

独立阅读报告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2009 年01月 第3卷第01期

独立阅读细则

1. 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2. 自2007年7月1日起，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3. 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4. 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
5. 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执行编辑

苏小和
王晓渔
成庆
言一
汪伟

助理编辑

李伟为

观察员

写作

戴新伟 | 广州
朱白 | 广州
罗四鸽 | 上海

经济

苏小和 | 北京

文史

王晓渔 | 上海

艺术

言一 | 成都
成庆 | 美国·波士顿

特约撰稿人

羽良 | 北京
严飞 | 美国·旧金山
莫之许 | 北京
吴强 | 德国·杜伊斯堡
张昕 | 美国·洛杉矶
刘柠 | 北京
沈展云 | 广州
马慧元 | 加拿大·温哥华
曾园 | 昆明
凌越 | 广州
孙晓骥 | 北京
程明 | 济南
马庆 | 上海
张无极 | 北京
曹嘉捷 | 上海
连步晗 | 广州

翻译

陈丹丹 | 南京

编者按：2009年，刊物姗姗来迟。幸运的是，毕竟还能应着农历新年的景，将改版后的第一期作为送给各位朋友的新春贺礼。

改版自然是想“继往开来”。在这期，我们尝试加入原创诗歌的内容，意在说明，如何描绘今天的历史处境与心灵特质，其实一直都是《独立阅读》努力的方向，但是这样的任务完成的是否令人满意，自然需要留待各位读者的评判与审视了。

最后我们要感谢的是三辉图书的应亚敏小姐，没有她的技术支持，我们的改版将是不可能的任务。

2009年1月第3卷第1期

目录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经济	苏小和	
	文史	王晓渔	
	艺术	言一	
	音乐	成庆	
阅读报告 台港海外	香港	严飞	在新野蛮时代寻找文明
	英格兰	孙骁骥	回归童年，上海龙华难民营
声音		言一	从唱片到现场：Indie的钱\前程
		成庆	罗大师罢演的背后
译介		福阿德 阿加米 陈丹丹 译	亨廷顿的警告
诗歌		连晗生	皮格马利翁的烦恼

春节

期间，我把自己关在家里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美国人保罗·海恩等人的著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11月第五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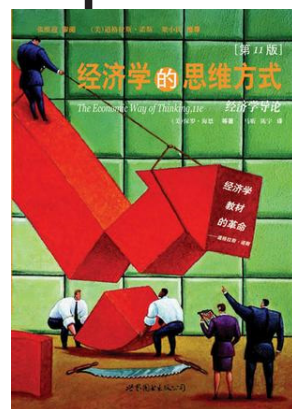
第十三章“市场与政府”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市场失灵，指市场过程无法达到最佳标准。这也意味着政府的补救措施能够促使市场系统更接近假定的最佳状态。善意的人们，包括经济学家，常常以为政府官员拥有改造现实经济协作问题的信息和动机。但是政府有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海恩接下来就引用了布坎南的话：“经济学家在分析市场失灵的同时，也同样有分析政府失灵的道德义务”。由此，海恩对自己说，要牢记布坎南提出的职业道德。

海恩的陈述当然有两重意义。首先是关于政府失灵的问题，他依然从产权概念出发。“政府是众多不同的人在优势产权基础上的互动”。因此，海恩毫不犹豫地指出，“政府政策往往受到特殊利益的支配。政府往往会采取给多数人带来小小伤害的行为，而不会实施让少数人极不高兴的行为。政府政策不是由公共利益引导的，而是由永无止尽的一系列极度偏狭的利益引导的。”

海恩的这些话让我恍然大悟。相当长一段时期，我总是把市场和政府当作一对界限明显的二元结构，并认定市场主导经济运作，而政府则主导公共利益。事实上，现代经济学自从亚当斯密以来，都基于理性经济人和产权关系来推演。这就意味着，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理性经济人产权问题可能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第一问题。无论是何种政府，当然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理性经济人来组成，而政府政策的出台，在海恩看来，并不意味着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就一定只追求公共利益。甚至我们可以说，任何一种政府政策的出台，可能都带有某种私人解读，这种解读必然要经过各种私人利益的过滤。所以，海恩的结论相当果断：

“市场体系和政府之间的一般差别，大多数是经不起严密地审视的。首先，市场通常以私人部门为特点，政府机构和官员占据的是公共部门。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并不意味着市场中采取的行动纯粹属于私人问题，不会影响公众；也并不意味着为政府工作的人，就一定是追求公共利益”。



沿着海恩的教材，我们说开去。众所周知，今天中国的经济格局，明显是一个超大型政府，而这个超级大政府存在的最大理由，当然是这个国家的公共利益。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会有30年来的发展？为什么国家经过30年的发展之后，贫富悬殊更加严重？为什么我们的经济结构慢慢演变成了一个必须依赖出口的格局？为什么国家的外汇储备逐年看涨，以至于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政府在国际舞台上似乎第一次呈现出某种财大气粗？为什么这种财大气粗的背后，却是国内民众的怨声载道？为什么现在最有钱的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越到下面，越难以为继，只能靠招商引资出卖土地为生？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大多数都是在做政府生意，很少有企业会在核心技术方面进入大投入，大开发？为什么那么多跨国公司来到中国，也是绞尽脑汁与政府建立某种潜规则的联系，似乎离开了中国政府，他们在中国就不会赚钱了。

现在我们要问：这些以公共利益为旗帜的政府利益，究竟有没有“经过各种私人利益的过滤？”当那么多看上去很美的政府政策出台的时候，谁敢肯定，那些在政策背后的公务员们，真的就完全没有考虑过他们自己的利益？反之，当一些在普通人看来都匪夷所思的陈旧政策还在大行其道的时候，比如二元户口制度，比如土地公有制度，比如超垄断国有企业，比如政企不分的铁道部门，比如屡禁不止的贪污腐败，我们也要问，难道我们的政府政策制定者真的不知道这些陈旧的制度已经深深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么？我想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因为有太多的私人利益纠结其中，他们无法做到自己对自己的利益进行改革。除非被逼到悬崖边上，这个国家是不会主动进行改革的，他们因为既得利益问题，早就失去了改革的动力。

这样的局面让人叹息。我们深深怀念80年代赵紫阳先生不断呼吁的政企分开和党政分开。今天看来，赵先生才是真正有勇气对自己进行革新的伟大人物。所以有人感慨说，今天的中国问题，早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不再是中国和美国、日本之间的国家利益对抗，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利益格斗场。一方是强大的政府，以及政府背后暗藏着的一批强大的理性经济人，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正在与真正的市场经济做殊死的格斗；一方则是市场，众多理性的经济人前所未有地认识到，只有与政府建立起必要的合作关系，才能最终迎来真正的利益。这个庞大的政府，像一个无所不在的超级裁判，又像一名孔武有力的运动员，我们的经济终于有了今天的形状。

我是很感激海恩的这本著作的，他真的让我对很多中国经济问题有了深度理解，或者如海恩所言，我真正建立起了理解中国经济的经济学思维方式。比如春节前后的农民工返乡、回城问题，在我看来，正是一种政府背后利益集团一手导致的结果。1月份，我在南方都市

报新伟老师的再三督促下，终于将盛来运的《流动还是迁移》读完。那种阅读之后的感慨与思考，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当金融危机在美国开始兴风作浪的时候，很多中国人以为那是美国人或者欧洲人的事情，稍微有些敏感、有些视野的中国人会提醒自己捂紧口袋，现金为王，以便度过接下来可能来临的萧条。很少有人能想到，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数以万计的中国中小企业会纷纷倒闭；很少有人会想到，首先遭到金融危机冲击的中国人，显然不是那些在写字楼中顾影自怜的白领，也不是国有企业里人浮于事的员工，而是那些背井离乡到城里打工的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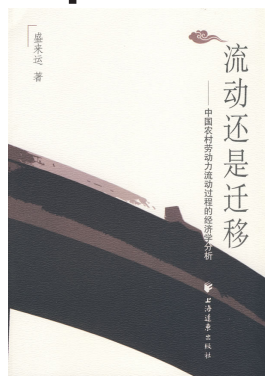
是的，就是这些永远在路上奔波、满面尘灰的中国农民工，成为这场全球金融危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往年的这个时候，他们应该还在城市喧闹的车间里挥汗如雨，应该还在计算年底能带多少钱回家。但是今年不一样了，春节的爆竹声还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可是农民工却需要打点行装，提前回家。

这当然是一个让人难过的经济画面。为什么我们的农民工每年春节前要挤上火车回家过年、春节之后又挤上火车去城市里谋生？他们为什么不在一座城市里定居下来？事实上这样做既可以免除旅途的劳顿，还可以节约成本。为什么被金融危机伤害的农民工不选择在城市里另谋职业，只能逃离城市，去到农地去寻找继续生存的可能性？事实上被金融危机伤害的，也有城里人，他们在一座城市里有自己的家，家是每个人的避风港，所以他们不需要在路上奔波，可是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家，所以他们只能回去，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似乎把农民工的这种大面积的流动当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传统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经济学现象。由此，我们自以为是地认为农民工的流动，而不是迁移，是中国农民的某种市场选择，甚至是理性选择。盛来运先生显然不认同这样的判断，他试图用一种经济学的分析，证明中国农民工的流动而不迁移，可能是一种制度性的歧视，是一种政策层面的对城市化的抵制，而这样的抵制，显然是以牺牲农民工的自由权利为代价的。

现在，我的手上就有盛先生的《流动还是迁移》（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10月）。盛先生显然是个实话实说的人，开篇就道出了实情：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却走了一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道路：优先工业化，抑制城市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一直限制农村



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通过无偿占有农业积累来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人民公社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和世界上最严格的户籍制度的配合下，农村劳动力被长期束缚在有限的耕地上，不能流动，不能参与工业化进程，更不能分享工业化的成果，结果本已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得到强化，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

显然，这种对农民的政策性歧视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是一种常态，即使在改革开放近30年之后，这样的局面也只是有所缓解，并没有得到制度性的纠正。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偏低是明显的事实，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于工业化率，违背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率要高于工业化率的基本规律。同时，我们看到中国的城市化率明显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出现了一个与一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完全相反的过程，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由此，中国农民工每年大面积的流动而不迁移，就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为醒目的经济学现象，同时也成为最为醒目的人口歧视现象。

放眼国际上多数国家，他们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迁移的过程，基本上是统一的。农村劳动力一旦流入城市，就自动获得了城市居民身份，只要找到工作，就可以安居乐业。他们的流动过程是：外出——>留城。

7 这样的人口流动迁移链中，间或可能发生劳动力回流的情况，但并非是出于迁移的制度性障碍，而是一种基于个人的其他因素的考量。

但今天的中国农民工显然不一样。劳动力外出了，不一定在城市里留下来，经过多次回流，辗转反复，也很难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所以，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他们不能轻易放弃农村的土地和房屋，也不能随便拖家带口，许多无形的或者有形的枷锁限制了农民工的创业自由和迁移自由。城市只是他们工作的场所和暂居地，城市居民身份是可望不可即的。他们的流动过程是这样的：外出——>回流——>再外出——>再回流……

毫无疑问，这种简单的生活轨迹和工作轨迹，正在被中国农民工年复一年地简单重复，其间包含了多少令人沮丧的故事和心酸的感伤，也包含着多少无奈。有人曾经做过一个简单的统计，仅仅以每年流动的农民工人数来计算，如果参与到这种简单流动的农民工为1亿人，每年每个农民平均花掉的交通费是500元，一年中耗掉的农民收入就是500亿，而大家知道，在城市中最低工资人群，正是这些远道而来的农民工；有人针对农民工纷纷将他们辛苦积攒的工资邮寄回农村兴建房屋的现象做过统计，假如一个农民工将3万元邮寄回老家盖

房子，则这是一笔高达3万亿的投资，众所周知，今天农民工的主要生活工作场所已经是城市，所以，他们在农村投资修建的房子，80%处在一种闲置状态，既没有有效使用，也不可能流通，因为在政策看来，农民自己修建的房子，是一种典型的小产权房，不能进入流通领域，而一旦没有流通，就意味这广大的农村，没有一个明显的房地产市场。

这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而且是对农民工收入的一种政策性浪费。政府锁住了城市的大门，同时也锁住了农民在城市里投资消费的通道，逼迫农民工回到农村进行附加值和使用价值极其低廉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由此，农民工的辛苦劳动价值再一次因为政策歧视而贬值，而城市的发展，城市整体的消费能力，尤其是一直被政府挂在嘴边的所谓拉动内需，再一次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要这么做？盛来运认为这可能是我们的政府过多地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过度城市化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城市病，比如城市社会治安的拥挤与混乱，还比如国外常见的贫民窟和棚户区。盛先生是真正的体制中人，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副司长，相信他的分析符合实情。但这种基于追求社会稳定、规避政治风险的歧视性政策，真的会长久带来社会稳定，或者降低政治风险么？到今天为止，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实证分析，充其量只是一种经验判断，是一种制度性的故步自封。事实上，任何一个政府也都承认，大量的农民工进城，首先带来的，是经济的发展，不仅是农村的发展，更是一座城市的发展。

可是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政府似乎把农民当成了城市的一种负担，他们希望农民在取得城市经济一定的溢出效益之后，回到农村里安居乐业，并以这样的方式来收获社会稳定。所以，当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涌进城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并没有出台加快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政策，反而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著名的新农村建设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上加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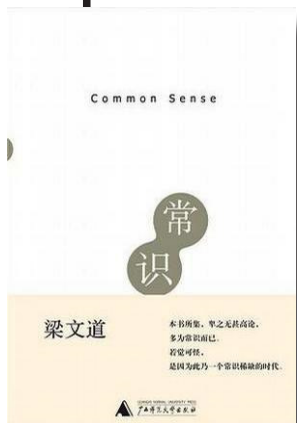
作为一个对人口迁移模型非常熟悉的学者，盛来运当然对新农村建设运动提出了自己谨慎的怀疑。他直接指出：

“相对于宏观经济而言，新农村建设是否是最经济有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农村基础设施为重点的新农村建设，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因为这需要大批投资，且有的投资在农村人口转移之后，是不必要的。”

盛先生的结论当然是在大量数据分析和学术模型基础上演绎而来的，但在我看来，这更多的却是基于一种事实的判断。有农民在接受调查的时候如此说道，政府的确为我们办了好事，

而最大的好事，是允许我们农民到城市里打工。这是一个极有含金量的表述。今天中国农民工的主要收入显然来自于他们在城市里的劳动，而不是田野里的耕作。认清这一民情，我相信盛先生对新农村建设运动谨慎的质疑，便具有了足够的实证理由和难得的学术勇气。

再推荐一本书吧，梁文道的《常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1月份，文道兄在北京做这本书的推广，我们海阔天空地聊了一通，很有意思。我曾经遇到有人问他，什么是常识？当时我有些激动，在一旁跃跃欲试，想说话。可惜不便打扰，只好一个人在心里嘀咕。是啊，什么是常识呢？在我看来，海恩所说政府官员必须超越私人利益过滤，真正关注公共利益，就算是常识，尽管在当下的中国，可能没有某个政府官员做到这一点，但这只能证明我们还是一个常识稀缺的国家；在我看来，一个农民天生就拥有和城里人一样的户籍，不能将城市人和乡下人划分成两个区域，这不仅破坏了市场的运行，还侵犯了基本的人权，这就是常识，不能因为这个国家几十年都奉行这样的二元户口政策，就习以为常，事实上，这再一次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常识稀缺的国度里。在我看来，当年梁启超、章太炎论战，清政府固守其道，常识就在梁启超这里。清政府作鸟兽散，章太炎的革命也让中国遁入百年苍茫，只有梁启超先生的改良没有人尝试。如此看来，中国是一个多么不喜欢常识的国家！当我这么说的时侯，梁文道在一旁哈哈大笑，点头称是。不过我必须说，一个常识的建立，可能与视野有关。只有看到了多元的信息，接受了多元的训练，我们才可能对常识产生熟悉感。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认为，我的常识是远不及梁文道先生的。我甚至不是说他是个很好的读书人，只是提醒我自己，他有台湾视野，香港视野，如今又有大陆视野，这比我们只有大陆视野的读书人，可能更善于辨识常识，接受常识。我曾经对他说，文道的常识，是一种成长的经历，是一种生活，而大陆很多自以为有常识的人们，可能只是一种知识，一种阅读。当某种知识需要出现在具体的生活中去的时候，这种行为层面的常识，比起书本里的常识，那是要大打折扣的。所以我坚定地认为，在当下的中国，要谈常识，可能还非梁文道莫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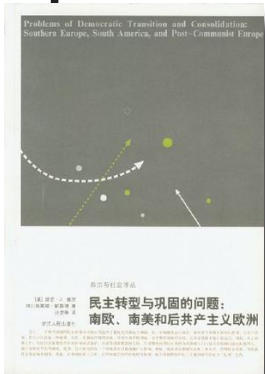


2008年，中国立宪百年。一百年前的夏天，清廷颁行《钦定宪法大纲》，虽然君主大于立宪，宪政之门终于由此打开，“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直到年末，我才注意到这个周年纪念日，然而，回顾这一年，却发现自己的阅读早已围绕宪政而展开。

年初，读到林茨和斯泰潘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民主转型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但民主的巩固是一个更为艰难而缓慢的进程。民主转型将会开启巨大的政治能量，出于对这种能量的恐惧，一部分人选择稳固的威权。然而，威权自身是脆弱的，只能依靠暴力给公众制造一个稳固的幻象，一旦崩溃，要比民主转型危险得多。这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南欧、南美和东欧，我阅读的时候却时时想到台湾，2008年台湾的进程，也证明了台湾已经从民主转型进入民主巩固的阶段，“地区领导人”的更迭以和平的民选方式进行，前任“地区领导人”的舞弊通过司法方式得到清理。《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提出民主的巩固需要五个场域：公民社会（结社和通讯自由）、政治社会（自由和开放的选举竞争）、法治（立宪主义）、国家机器（理性-法律的科层制规范）和经济社会（制度化的市场）。这五个场域互相关联，很难单独展开，尤其前三者是巩固民主的先决条件，如果只着眼于构建经济社会却没有其他四种场域的支持，这种经济社会只是空中楼阁，会有致命的问题。

10 张朋园先生的《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月）讨论了清末的咨议员及资政院议员选举和民国的三次国会选举，反思民主政治为何在中国屡选屡败。其中很多具体论述值得重视，他指出清末的选举“官民互动、士绅表现雍容醇厚，谦让有礼”，当年士绅约一百五十万人，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构建市民社会的前景是乐观的。对于备受指责的贿选，他引用一些社会学家的观点，表示社会面对贿赂与暴力，两害取其轻，容忍贿赂、避免暴力，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他认为市民社会未能构建以及贿选的出现，与经济欠发达有关，并且认为衣食足而后知权利，这就有些经济决定论的成分了。经济社会的重要性以及它对市民社会的推动力，不可否认，但是如《民主的转型与巩固的问题》所说，市民社会和经济社会需要互相支持，认为经济社会形成之后再构建市民社会，恰恰是忽视了两者的这种关系。

对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民主试验，我特别同意罗隆基先生的观点：“其实民元至民十六年那段中国宪政历史，那固然是宪政的失败，那却是国家实施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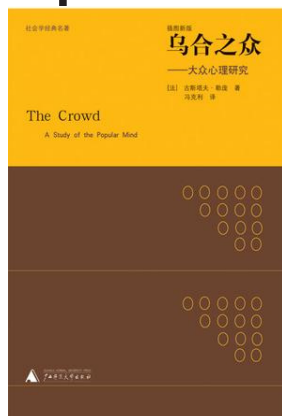


政必经的过程。倘以那段宪政过程中之波折，即断定宪政在中国永无成功可能，那是缺乏历史的眼光。”中国宪政历史不仅从民元开始，还可以追溯到清末的咨议员及资政院议员选举，可惜关于这一段历史，有着太多的误解。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0月）里，徐贲先生围绕“政治和存在主义”、“记忆和见证”两个主题展开讨论。他指出，营造单一的记忆神话和压制不同的记忆必然是同步的。这几年我一直在读民国遗民们的回忆录，发现“民元至民十六年”这段记忆最为单一，不过不是记忆神话，而是记忆妖魔化，其背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宪政的妖魔化。

极权主义的魅力只能吸引精英和暴民，群众往往被宣传征服，这是《极权主义的起源》（三联书店，2008年6月）的洞见。阿伦特的这本书，全面论述了极权主义的运营机制，她指出宣传主要诉诸于外部的非极权主义者，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灌输取代了宣传。换句话说，“敌我矛盾”靠宣传解决，“内部矛盾”靠灌输解决。阿伦特注意到宣传和广告的相似性，但是她没有因此把二者等同起来，她指出商人通常不会装扮成先知，极权主义却会强调自己的预言是科学的。波兹曼在《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里指出，奥威尔害怕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害怕文化成为庸俗文化，他认为：“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波兹曼对“娱乐至死”忧心忡忡，但如果可以选择，就像在贿赂和暴力之间两害取其轻，我会选择“娱乐至死”而不是“专政至死”。

2008年有着非常多的“集体活动”，让人窃喜或者让人焦虑。在2008年12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上看到，学者于建嵘向朋友们推荐《狂热分子》、《乌合之众》和《群氓之族》。勒庞的《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不算新鲜，码头工人哲学家霍弗的《狂热分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伊罗生的《群氓之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是第一次见到，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提醒独立思考的个体与那种疯狂又富有激情的群众运动保持距离。除了这几本，卡内提（通译为卡内蒂）的《群众与权力》（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也值得阅读，文学家的冷静在我们这里似乎特别稀缺。

一年前，在为《中华读书报》撰写个人年度阅读回顾时，有感于那一年的波澜不惊，我这样写道：“2007年尚未过去，我已经把它遗忘。”那时完全没有想到2008年的波澜壮阔，现在，似乎可以这样说：“2008年尚未过去，就可以断定它必将被反复提起。”接下来的2009年，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呢？我准备以不变应万变，依然在阅读和思考中度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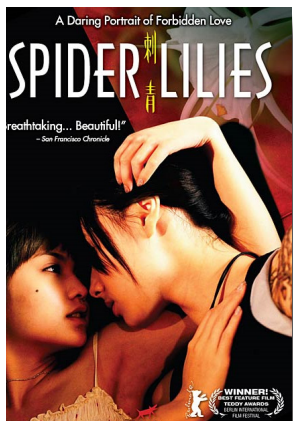




每到年末，各式各样的盘点总是层出不穷。就我个人而言，一直觉得盘点是件颇费心力的事情，基于大众传媒层面的盘点更是容易处于吃力不讨好的境地。可是另一方面，我却又十分喜欢阅读这些出现于种种媒体之上的盘点——无论是它们提供的视角还是数据，一旦挖掘起来都能获得一些饶有趣味的东西。与此同时，这样的盘点也总会提醒我时间的飞逝，得了空闲也不妨回望上那么一眼。只可惜，我一眼望去，年内的华语电影实在萎靡。相比之下，华语音乐方面倒仿佛迎来了一个小丰收——至少在年底，就有佳作出现，而华语电影却是一部都没有。



与之形成更加强烈对比的，是碟市上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的无数佳片。远至马塞尔·莱尔比耶在1928年导演的默片史诗《L'Argent》，近至08年戛纳导演奖获得者锡兰(Ceylan)的《三只猴子》都可以从碟市上买到。(另，前些日子刚刚辞世的克洛德·贝里之名作《甘泉玛依》和《恋恋山城》正好有蓝光转制的版本出现，有心者不妨留意，相比之下《老人与小孩》要难找许多)但若谈及在十二月最为吸引我目光的影片，却是一系列由BBC和PTS制作发行的纪录片。在我的视域里，它们几乎是恰如其名地掀起了一股纪录狂潮——这同样也是一张双碟装台湾纪录影片合集



的名字，在其中收录了号称台湾当代影像史上最为经典的纪录作品。单是从其所收录作品表现出的不同关注点上，我们便可察觉大陆电影人与台湾电影人在纪录片方面的差距。顺便提及的是，近年来以《刺青》和《漂浪青春》而为大陆影迷所知的女导演周美玲的作品《极端宝岛》亦有选入其中。该片将镜头指向那些处于社会边缘境地的女性，细细刻画其生命形态；在对边缘女性的关怀这一点上，倒是与其后来的电影走向一脉相承。

若说起BBC，不曾听闻的人大约屈指可数；然而说起PTS，熟悉的人可能就不那么多了。所谓PTS，也即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的缩写，翻译过来便是公共电视部门，台湾人简称其为公视。公视自98年建台起，至今已十年有余，其间一直坚持属于全体民众，不专为政府或某一政党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也不受商业或利益团体左右为其制作影视之宗旨。前面曾提到的《纪录狂潮》中所选的影片，便是精选自公视99年起所开设的《纪录观点》栏目。而说起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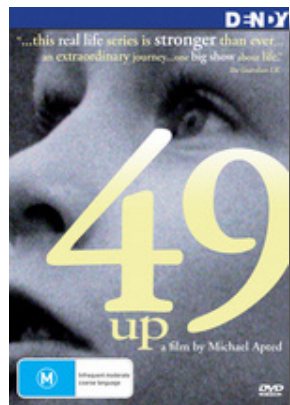
对公视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则是源自于《城市的远见》一片。在这部以城市为主体的系列纪录片中，公视记者走访了全球十三个城市，深入了解该城市的建设历程，通过全面而细致的走访，实实在在地揭示出了那些在造就一座美丽城市过程中的关键细节所在。并且，在片中担任解说以及接受采访的，全部都是曾切身参与过当地城市建设的专业人士，比如《古川町物语》当中的西村幸夫(《再造魅力故乡》一书的作者)，又如《震起的希望》当中的谢英俊(5.12之后，谢英俊亦积极协同ngo参与到大陆的重建当中来，只可惜势单力弱，那些在9.21重建中成为闪光点的建筑文化，城市文化建设，设计生活，遗产保护，城市创新等相关理念，搬到大陆只能成为泡影)。公视纪录影片的质量水准之高，亦由此可见一斑。



不无巧合的是，我与公视之重逢，又是因为《城市的远见》的姐妹篇《国家的远见》。《国家的远见》共八集，其选题总共涵盖了文化创意、环保能源、农业、人口政策、教育、城市改造、经济发展这七大议题。片中，公视分别将镜头指向不同议题下他国的成功典范，仔细剖析寻访其成功缘由，以期能从中发现可以为台湾借镜之处。坦白地说，上述这七大议题无一不是兹事体大——既决定于一国之相关政策，又与国民未来之福祉息息相关，故而一旦真正涉及借镜或是经验移植，操作上难度不可谓不小。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一在行动和实践层面的乏力却并不能抹杀这一系列纪录片的意义。至少，它成功地为公众提供了一系列明亮可鉴的镜子；至少，它成功地唤起了公众对上述议题的关注——由于这些议题关乎自己福祉，公众必然会因此有所行动。尽管，这样的行动往往并非立竿见影，但日积月累的长期打磨却也正是理想制度的成形之道。

在某种程度上，公视(PTS)以其作品的前瞻性和批判性成功了扮演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而同样的知识分子，在英国BBC，美国PBS，日本NHK，大陆呢？大陆有什么？我希望答案不会是湖南卫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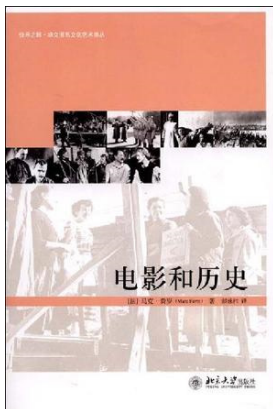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股纪录狂潮中，有部名为《49up》的纪录片以其史无前例的长期性质和真人性质颇为引人注目。这部影片始拍于1964年，导演Michael Apted在英国找来十二个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七岁小孩，谈论他们各自所设想的未来的生活以及梦想，并取名为《7up》。此后，每隔七年，Michael Apted便回去重访那些逐渐长大的小孩，再次谈及他们眼下的生活，谈及他们当年的设想。及至今年，这批小孩已经49岁了。而这部《49up》所收录的，便是此前多年访问的精



华剪辑。表面上来看，这应当是一部十分无聊的片子，但看过之后相信你会有不一样的判断。巨大的时间跨度，大约是这部影片公开的秘密。

巨大的时间跨度里究竟包含着怎样的秘密？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我自己，则更倾向于在马克·费罗的指引下，来探究这一秘密。巨大的时间跨度背后往往隐隐写着“历史”两个字，而在马克·费罗的著作《电影与历史》(这里书名按个人偏好采用台版译法)当中，他为我们指出了从历史解读电影和从电影解读历史这两条可能的路径。

在我看来，从历史的层面的解读电影，更多的是一个电影史层面的问题，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一个社会电影史的问题。在这条路径上，我们将把目光投向当时电影技术的发展水平，电影制作的商业化程度，观众所处社群(community)的文化认同，



换句话说也就是生产和接受电影的社会状况。这条路径意味着社会学，社会史，电影史，电影理论的多重交叉。而马克·费罗所提出的另一条路径，则触及了史学层面的一个更为敏感的议题：电影能否作为史料而存在？影视史学[注]是否可能？

说起来，马克·费罗本人并非是影视史学(historiophoty)一说的始作俑者。颇为值得玩味的是，首先提出historiophoty一说的人却也正是“meta-history”(元史学)一说的提出者海登·怀特。在1988年12月的《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上面，怀特发表了《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一文，对另一史学家Robert Rosenstone就影视史学议题所发出的疑问进行了充分的回应。

电影，作为史料的载体之一是否应当取得与文字史料在史学体系中同等的合法性地位？电影，或影像，是否是一种比文字更适用于记载史料甚至于撰写史学著作的方式呢？要知道，至少在感知(perception)这一层面上，影像比文字拥有更加令人无法招架的说服力，更加容易让人产生影像不会说谎这样的错觉。在此问题上，怀特与Rosenstone站到了同一阵线。在怀特看来：制作一部史料性质的影片中所使用的剪辑方式和叙事手法，与文字撰写的史学著作中对史料的甄选及其所采用的修辞与诠释手法相比，其实并无二致。于是，他在Historiography的基础上，借用phot发光的古意，造出了Historiophoty(影视史学)一次，意指运用影像方式对史料和史学概念的表达。

如果说，怀特与Rosenstone是在史学的一个十分meta(根源，宏大)的层面讨论问

题的话，那么马克·费罗则是在一个更具有应用性质的层面展开论述。马克·费罗一方面接受了电影/影像作为史料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充分意识到了电影/影像语言本身所具有的欺骗性质，和电影/影像制作人在其中的能动性，并由此展开了社会对电影所产生的影响的诸多考量，展开了类似于对文字史料所进行过的甄选过程，同样力求去伪存真，从电影/影像中发掘关于过去的信息。用马克·费罗自己的话说：这其实是一个如何理解过去的问题。唯一的不同在于，文字史料的甄选往往局限于其他的文字史料和物证，而电影/影像史料的甄选既需要参考同时期的电影/影像，也可求证于相关文字文献与物证；不仅仅需要史学方面的考证功夫，更需要对社会史，政治经济理论方面的把握。无疑，不论是对于史学家，电影学家，还是社会学家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整个十二月，我除了收获了PTS，收获大量优质纪录片，也还收获了李宗熹带领下的台湾戏剧表演家剧团。这是一家立足于高雄的年轻剧团，从建立到现在不过几年的光景。尽管前后也曾获得一些奖项，但比起表演工作坊来，无论是在名气还是戏剧表演本身方面都有不小的差距。但在看过他们三部作品之后，你却不得不承认他们是一个十分有潜力的团体。他们在简易布景下结合灯光和灵活的场面调度所发挥出的戏剧能量是令人惊叹的；而他们在创作题材的选择方面亦十分贴近生活，贴近台湾的民情。特别是《霸王卸甲》，其中对中年危机和男女差异的刻画令人痛到刻骨。若不是有一个还算光明的结尾，恐怕不少人会心痛到艰于呼吸。

十二月，除了盘点，也还是个补漏拾遗的好时机。不论是Jay-Jay Johnson的《Self Portrait》，还是Kathryn Williams与Neill Maccoll合作的《Two》都令人感到暖意融融，而像Stoa的《Silmand》和Sun Kill Moon的《April》则是一如既往的动听。试问，还有什么事情比手执一杯温热的黄酒跟着升哥高唱一曲：“黄粱一梦二十年”，更适合安度一个冬季的呢？在此，谨祝独立阅读的各位朋友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注]：Historiophoty一次最早由台湾教授周梁楷译作影视史学，其中影视一词中的“视”其实强调了所有视觉形式的载体，把海登·怀特的定义大大扩大了。而我个人更倾向于把Historiophoty译作相对狭义的影像史学。但出于对惯常译法的考虑，依然采用周教授的译法。特此说明。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波士顿早期古乐节给会员们的信中如此开篇，什么事情会让一个音乐团体如此郑重其事？

这是一封寻求捐助的信，美国的古典艺术团体没有政府支持，大部分都是靠社会捐助存活，财大气粗如波士顿交响乐团，可以寻找到UBS这样的金融财团作为奥援，稍有名气者也可寻找到一些中度规模的金融企业来作衣食父母。不过如今世道突变，金融业纷纷宣布减少甚至停止对艺术团体的捐助，因此这些组织纷纷加大寻求捐助的力度，也才有波士顿早期古乐节写给所有会员的哀切之语。

事态还在继续恶化，就在上星期，早期古乐节宣布取消今年六月将演出的18世纪的德国作曲家葛劳普纳（Christoph Graupner）所作的《安提奥库斯与斯查冬妮卡》（Antiochus und Stratonica），该剧自从1708年在汉堡首演之后，再也没有上演过。而如今换成了蒙特威尔第的《波佩阿的加冕》（The Coronation of Poppea），之所以改变计划，仅仅是因为钱的问题，因为更换剧目可以使原来的160万美金预算削减到如今的70万美金。



如此惨淡，作为乐迷，自然心存忐忑，这并非是为无缘得见葛劳普纳大制作的歌剧而惋惜，而是对于今日艺术生存的脆弱感觉到不安。而同时，欧洲美国古典乐界却流传着一种论调，“未来古典音乐的希望在中国。”这种乐观来自于中国近年来在艺术事业方面的大手笔投入，比如国家大剧院，各种名目繁多的艺术节，更重要的，还有全民学琴的狂热，这些都让人产生一种感觉，中国人似乎能在这个领域具备某种“后发优势”，赶英超美，指日可待。不过我始终认为，弹琴并不等于艺术，艺术的本质不是工匠技艺，而应是人类心灵的型塑与提升，所以中国人学习、聆听西洋音乐，本质上其实是要找到自己特有的音乐表达方式，不过要接续上民国初年萧友梅、黄自那代人所未完成的西洋音乐本土化传统，如今看来，长途漫漫。

由于圣诞长假，此地的音乐演出一月中旬才陆续展开，不过这短短两个星期，就已经有数场重头演出，首先报告的是威尼斯巴洛克乐团(Venice Baroque Orchestra)在Emmanuel 教

堂的演出，曲目是一组维瓦尔第的作品，其中有弦乐协奏与小提琴协奏，尽管指挥Andrea Marcon因故未随团前来，但是著名的巴洛克小提琴演奏家Giuliano Carmignola却是出尽了一夜的风头，让济济一堂的观众饱足耳福。

维瓦尔第的弦乐作品之多，浩如烟海，当晚曲目于我而言，都是相当新鲜的，但是唯一要抱怨的就是教堂座位实在不太理想，一是距离乐队太远，二则是视线严重干扰，以至于大部分时间，我只能单纯依靠听觉，一边仰望着教堂的穹顶，可惜这次，我并没有产生任何奇妙的感觉，反而觉得空间和声音如此不协调。

但是Carmignola这位“巴洛克小提琴王子”的技艺却是相当不凡，这种不凡在于他对整个乐队的带动和把控上，尤其是指挥缺席情况下，他更是将整个演出节奏牢牢控制住，因此你会感觉到整场演出的层次感极强，这或许就是明星的作用，他就Giuliano Carmignola是无意中显现出来，然后悄悄夺走对音乐的把控，让乐队都随他而去。

回到维瓦尔第的作品本身上，他的弦乐作品长度都很短，而且“快-慢-快”的三乐章结构也不复杂，当然，他此时做的工作是开启未来协奏曲的一个范式，巴赫等人也曾抄下其作品的曲目在键盘乐器上演奏。而且他的音乐的反复表达也是十分重要的特征，这种反复表达对于很多人而言，觉得是单纯的重复，无甚意义，事实上，维瓦尔第此时的确无法展现出巴赫那样的丰富变化，有的段落的确让人觉得腻味，让人感觉兴奋的仍然只是巴洛克的特有音色处理，那是一种气味，当从第一个音开始，它就给你层层包裹，没有高潮，没有情绪的夸张起伏，于我个人而言，这种感觉常常让我想起小时的天井雨声，四周寂静，唯有那滴滴雨声将呆坐在门槛上的我卷入另外一个世界。



另外两场则都是BSO的演出，其中一场是新年之后的开年演出，曲目分别是莫扎特的芭蕾舞剧“IDOMENEO”中的恰空选段，以及海顿的大提琴协奏曲与亨德尔著名的“水上音乐”。仔细想想十分有趣，从时间序列上看，莫扎特最晚，海顿居中，亨德尔最早，如此倒装的曲目安排，让人由今入古，分明是告诉听众，我们是在追本溯源！

当晚曲目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海顿的第二号大提琴协奏以及亨德尔的水上音乐，这不仅是因为曲目本身对于我而言，是十分熟悉且喜欢的，而且当晚的大提琴演奏是荷兰中生代演奏家Pieter Wispelwey,他的老师包括有著名的毕斯马(Anner Bylsma)和普利斯(William

Pleeth)，熟悉大提琴演奏圈的人或许知道，前者是以恢复古乐演奏而闻名的荷兰大提琴家，后者更是培养出天才大提琴家杜普蕾的启蒙老师，被杜普蕾亲切的称为Cello Daddy（大提琴爸爸）。

不过演奏前，我脑子里关于海顿的这支曲子，其实浮现的却是俄罗斯大提琴家沙弗兰的演奏版本，海顿的曲子大多都是为宫廷贵族而写，要想从当中听出什么辗转悱恻，悲天悯人，本是难事，不过沙弗兰的演奏却将这支海顿的曲子揉进俄罗斯的豪迈与悲戚，不象海顿，但是却真的很感人。



Wispelwey当晚的演奏其实让我有点吃惊，因为他第一乐章的演奏让我很为他捏把汗，因为他明显是在用自己的个性化节奏进行演奏，因此他的分句和停顿都经常出人意料，虽然说这种演奏在后面发挥的越来越好，但是第一乐章无疑并未能完整表达出他的这种个人特点，反而显得不够流畅，失去了海顿这支曲子本身具备的旋律美感。而且他的这种个人特性也让乐队迷失，不知该如何配合他的节奏，于是就常有大提琴的节奏多变，乐队齐奏却是整齐划一，亦步亦趋，犹如一个哲学家与士兵的相遇，多变与纪律，在这里形成了强烈的冲突感。

至于水上音乐，也没有让我感到愉悦，尽管指挥Bernard Labadie努力的在表达巴洛克的节奏，但是由于乐器问题，音色远远不如巴洛克乐器的音色那么温暖迷人，在偌大的交响乐厅里，弦乐的金属色泽感在亨德尔的曲子中马脚频现，好比是手工匠人走入了现代工厂，亲密感消失了，转而是让一种“人工僵硬”的声音开始涌现，或许，用现代的乐器，在现代音乐厅空间里演奏巴洛克音乐，我们未免太自信了一点。

《新野蛮时代》，南方朔著

联合文学出版社，2006年

有些书，如果没有导读，就最好不要轻易读下去；还有些书，即便有导读推荐，却多半形同广告或友情赞助。一个作者出了书，出版商就会找知名人士写个简单的书介，宣传的意义大过阅读的意义；再有些书，虽然导读做的专业尽责，可却站在小众的立场上走菁英路线，原本是要扮演书和读者中介桥梁作用的，结果却演化成了一个丑角，普通大众面对这样晦涩艰深的书评，反而会被吓到，对原书也敬而远之。



因此，从这层意义出发，一篇具有公信力的书评、书介或导读，是以读者为考量，帮助他们打开一本好书的钥匙，是批判式阅读和创造式阅读的先决条件。而一位称职的书评人，必然是良心与理性的代言人。他们以公共视角为标准，难的书浅写，让人敢与接近；浅的书则深写，让人多一点反思空间。

这本《新野蛮时代》，就是这样一本由称职书评人写就的深具公信力的书籍推荐、评论之合集。全书分为三辑，共收录了32篇书评或导读，每一辑都围绕着一个大主题展开叙述，或政经，或思想，或文学。作者在深入浅出，纵横捭阖的同时，亦喜欢把同一主题的新书加以对比总评，比较优劣得失，让读者准确把握原作品的本意之外，又能增广知识的宽度。

在第一辑“关于政治、经济、趋势”相关作品的导读中，作者藉由评论法国巴黎大学教授阿胥咯（Gilbert Achcar）代表作《野蛮的下一个社会》（The Clash of Barbarisms），指出我们目前所生活的世界，正处于一个新野蛮的时代。全书取名为“新野蛮时代”，正是反映了作者对当下时代的忧思。

野蛮时代的说法，出自于与达尔文齐名的19世纪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他在1877年写就的巨著《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中，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三个时期。



摩尔根的这种划分标准得到了恩格斯的赞同。恩格斯后来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又进一步认为，文明时代的阶级社会是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政治社会。

文明和野蛮就像人和影子一样分不开。作者指出，在目前这个早已进入文明社会的时代，全球民意或个别国家的民意，对统治者完全束手无策。统治者对民意的这种不屑，乃是一种否决了民主和民意价值的一意孤行，而这样的一意孤行，就是“野蛮的复辟”，也就是新野蛮时代的来临。

在新野蛮时代之下，一方面，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家，无时不刻地展现出种种野蛮的行径。对内，不择手段的摧残民众的人格，不择手段的限制内部人权和展开内部监控；对外，奉行只有强者的枪炮可以说话的国家原则。从这层意义出发，内政的新野蛮，正是为外政新野蛮构建了基础。

另一方面，就是人道胸襟和人文情怀在新野蛮面前的丢失。作者一直以来都坚信，人道精神与人文情怀，乃是一种必须透过深度阅读、深度思辨，始有可能形成的心灵态度和能力。然而遗憾的是，随着视讯媒体的普及，人们的阅读已经愈发趋于图像化、平庸化。人们不仅阅读能力和意愿大幅减退，而且对深度阅读也欠缺了兴趣和热忱。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大众人民逐步放弃了主动和独立的判断，自然而然的就很容易被不肖政客煽惑、歪曲、蒙骗，间接助长了统治者的骄横跋扈，野蛮堕落。

作者由此呼吁，只有读书，只有坚持读书，才可以在人格上保证精神的自由，在思想上启发人文的素怀，在道德上对抗野蛮的侵袭。当一个社会拥有自由理念的人越来越众多的时候，这个社会才可以真正算是文明的社会。³²篇书评，一部“新野蛮时代”，正是作者的苦衷和希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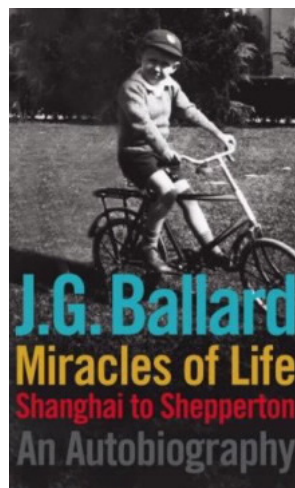
本书的作者南方朔，多年来除了担任多家报纸、杂志的主笔外，更是一位专业的读书人，他为书籍所撰写的导读已经超过一百五十多篇，名副其实地扮演起了知识分子与读者的中介人。他将自己在戏剧、人文、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阅读经验和体会，通过自我的消化、反刍，然后变成评论，与普通大众沟通。作为有着巨大公信力和影响力的书评人，“南方朔”三个字，已经成为当下台湾社会评判一本书有没有购买价值的标准。作为个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在南方朔看来，这一百五十多篇书评背后的阅读以及由此引发的延伸思考，才是最值得骄傲的。如他本人在这本书自序中所言：“我的书籍导读写到现在，总有一百五十

本左右了，这等于有机会去深造这一百五十本书，这使我能在阅读及写导读中加速知识的累积。除了自己受惠外，由于我写的导读不敢卖弄，还尚称实在，对读者或多或少有点帮助。”我有一次在台北敦化南路上的诚品书店购书时，就亲眼见到一位读者手拿一份南方朔做推荐的书单列表，有的放矢的在偌大书店里按图索“骥”。

什么时候，我们内地也可以诞生出这么一位“公共书评人”，透过他锐利的眸光，在这个新野蛮时代，为我们拨开迷雾，洞见一片文明的天地呢？

Miracles of Life: Shanghai to Shepperton by J.G. Ballard
 Fourth Estat, Feb 2008



曾为卡波特立传的作家杰拉尔德·克拉克尝言，“最好的传记作家向小说求教。”沿着这个逻辑推想，似乎小说家的自传就一定比别人更耐读。即便承认这个假设，当翻开英国作家詹姆斯·格雷厄姆·巴拉德（J.G. Ballard）的晚年自传《生活的奇迹》（*Miracles of Life: Shanghai to Shepperton*）时，读者心中还是难免嘀咕，巴拉德还能带给我们什么新意？

当然，对于之前从未读过巴拉德的读者来讲，这并不是一个问题。传记在内容上不乏吸引眼球之处。问题在于，由于作者在1984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太阳帝国》（*Empire of the Sun*）和斯皮尔伯格改编的同名电影，巴拉德已经被中国的读者理所当然地与反战作家联系起来，作者的真实生活反而因此受到了某种“遮蔽”——虽然上海龙华集中营的生活与电影中吉姆的遭遇几无二致：拥挤的牢房、疟疾、永远都缺乏的食品与水；同时，集中营也给一个12岁的男孩带来了另一种意义的自由。

“1930年11月15日，我出生于上海综合医院。多年后，母亲常对我说，由于她身材苗条，而我的头太大，以致在分娩时受挤压变形。”自传是以玩笑的方式开始的，巴拉德对他在上海最初的生活，似乎都带着几分戏谑的、漫不经心的描述。他回忆自己在新华路（Amherst Avenue）31号的洋房中，听见“收音机里嗡嗡响着蒋介石的抗战讲话，内容却不时被日本啤酒的广告打断。”尽管当时连侨民出行都须接受日本军队哨卡的检查，但30年代上海的公共租界依旧充斥着没完没了的聚会、典礼、歌舞、电影，来自英国和美国的水兵们每天依旧在酒吧厮混。

但对于巴拉德来讲，上海的浮华背后是血淋淋的残忍：“我在上海的街头巷尾见到了太多的暴戾和死亡，我把它们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至今还记得上海市政府每天都派卡车运送饿毙在路边的行人尸体，日本士兵用刺刀驱赶人群。而在陪父亲去纺织厂的路上，他看到黄浦江上随处可见用几块木板简单拼装的浮棺，躺在里面的人“穷得买不起一口棺材。”

珍珠港事件后，美日正式宣战。巴拉德全家也在1942年被强行遣送，羁押在龙

华集中营。与小说相反，现实中他并没有像吉姆那样被迫与父母分开。他写道：“被关押的最大一个好处就是你有更多的时间与父母相处。在我的生命中，我第一次与父母在一间屋子里同吃同睡。”巴拉德的父亲早年在上海经商，家境优裕，但也遵守着传统的英国家庭习俗，家规尤严。而在难民营中，当看到父母被战争吓得胆战心惊，成年人的世界丧失了权威，巴拉德认为这是人生重要的一课，只是“代价过于残忍。”

在一个未曾涉世的男孩眼里，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极度赤贫以及对于混乱与无序的体验，自然会直接影响到巴拉德今后的创作。他小说中的反乌托邦情节，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解放前的旧上海。当《太阳帝国》刚发表的时候，“熟悉我早期的作品和短篇小说的读者发现那本书里满是在旧作中出现过的意象……干涸的游泳池、废弃的旅店和夜总会、荒芜的飞机跑道和洪水四溢的河流。”小说《可卡因之夜》（Cocaine Nights）和《撞车》（Crash）算是此类作品的代表。尤其是后者，后现代理论家波德里亚曾以之为例，说明后现代社会中的暴力对道德维度的超越。

巴拉德并不同意波德里亚对自己作品的解读，他认为自己所关注的恰恰是道德视域。他相信，“人类的情感正在堕落，而我想要揭示这种堕落指向何方。我悲哀地发现，那些从未经历过暴力的人们沉迷于把它当作娱乐。或许娱乐化的暴力能够满足人类对于残酷的深层需要，这种本能只有当人类永久地处于战争之中时，才算得上是一项优点。”与狱友鲍比从仓库偷煤渣的场景始终在巴拉德的脑海中萦绕不散：“鲍比用一把废弃的刺刀从仓库墙角凿一个洞，伸手进去掏出几捧煤渣。”好不容易得手之后，巴拉德准备将“脏物”带回宿舍生火煮饭，但鲍比却用自己的那份煤渣在池塘边玩起了打水漂。这一幕使巴拉德体会到战争和长期的羁押对人心灵的扭曲，尽管“很难判断处于战争时期的道德行为”，但“对于鲍比这样的战争孤儿来说，我相信他生命中的某些部分已经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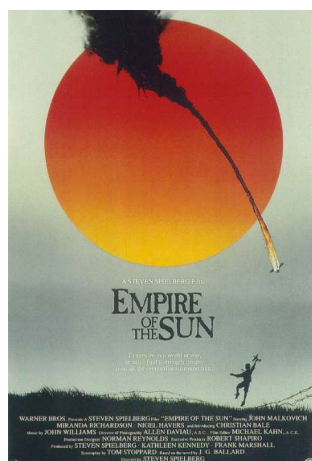
在年初接受《泰晤士报》的访问时，巴拉德说，当他在剑桥求学的时候，同舍有一位男生是奥斯威辛的幸存者。巴拉德从不在他面前提自己在集中营的经历，因为与他相比，自己在龙华难民营“养尊处优”的生活实在“微不足道”。对于巴拉德，集中营生活意味着一场战争游戏，而自由就是他的战利品。他的最大乐趣是跑到美国人营区与水手们下棋。作为酬谢，水手们会送给他诸如《生活》之类的过期杂志，巴拉德最初的文学根底，就是靠集中营的舶来杂志所培养的。

事实上，《生活的奇迹》更像一部即兴风格的回忆录。作者从自己78载的人生岁月里遴选出二十余个片断，以相对独立的形式加以呈现。一方面，这是出于作者个人的写作风格，同

时也是他的写作状态使然。自两年前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以来，巴拉德的健康一直由他的私人医生料理，正是在他的一再建议下，身体状况不佳的巴拉德才决定动笔写作。这本二百六十多页的自传仅花了他不到半年的时间。

在1947年回到英国后，他花了好几年时间才逐渐适应英格兰的生活。但巴拉德始终感觉自己与英国社会格格不入：“看着周围的英国人，我难以相信他们竟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他们更像一群失败者。”相反，“我在集中营的生活比以前快乐，这种快乐一直持续到我后来结婚、生子。”并且，“我记得上海，记得龙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在英国的生活真切得结束了剑桥的学业后，他来到和上海有几分相似区的谢伯顿（Shepperton）安家，做起了撰稿半个世纪。

巴拉德的所有作品都在昭示着一个复调主题，期的新浪潮科幻小说，到随后的《太阳帝国》及的仁慈》，再到《生活的奇迹》，我们可以清晰来一直试图寻迹自己童年的路径。在他的科幻小里，小男孩乘坐火车环游世界，为了寻找一片能够放风筝的天空。但是他不小心走得太远，以至于从地球的另一端回到了起点。巴拉德在1991年曾短暂回到上海，却再也找不到自己五十年前在静安寺路（Bubbling Well Road）骑自行车的影子了，那座以几何级数变化的城市早已不是他当初的起点。“我走向一个幻象，并在沿途中想象它是真实的，最后却穿越了它。”他如是说。



华，要比记得我多。”于是，在的伦敦，并在郊人。这一做就是

“回归”。从早其姊妹篇《女性地看到作者多年说《微缩城市》

《城市画报》把自己新年的第一期做成了关于两岸三地的独立音乐特刊，着力描绘了五大城市的音乐地图，并且提供了140多支乐队的相关讯息。对于喜好indie的乐迷而言，无疑是份不错的存档资料(尽管难免挂一漏万)，而其封面由大字所书写的“独立音乐时代”似乎也在诸多独立音乐人作为背景的烘托之下呼之欲出，蔚为大观。

就两岸三地的indie音乐创作来看，08年确实是一个丰收的年份，在这一年里单是通过唱片发行，我们就已经听到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声音，而若是加上通过网络和现场等渠道进行传播的音乐，那么这样的声音还要多上很多。这样的态势也许还算不上繁荣的来临，但却也已经意味着一片不小的天空。

这样的一种丰收，以事实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此前的一些观察，正面回应了我此前对于indie毫无保留的拥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于独立音乐(包括indie musicians和indie labels)，以及其传播途径，如myspace，last.fm都持毫无保留的拥抱态度。在我看来，独立音乐代表着一种鲜活的创造力，其音乐风格和词曲创作大多来自于音乐人生活的自然流淌，去除了传统唱片公司运作下的诸多基于marketing方面的考量。由于是音乐人独自包办了音乐制作的很多环节，所以在这样的音乐作品当中，如果你足够留意，那么你将发现一个又一个的小小惊喜——来自于音乐人在音乐细节上的小小创意——这样的创意常常体现在唱片的封面，文案以及包装上面。而独立音乐在传播渠道上的变革，则更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独立音乐人选择网络作为自身音乐创作的主要传播渠道，不仅仅是顺应了所谓web 2.0的潮流，也不仅仅是缩减了marketing的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打造出了一个基于网络平台的双向沟通平台。音乐人和音乐人之间有了更多的机会发现对方，开启相互之间的沟通与合作；音乐人和乐迷之间有了更为直接的沟通渠道——音乐人可以更快更直接地了解到乐迷的感受，而乐迷也有了更多机会深入到音乐人的创作历程当中。这样的一种互动，在传统的唱片工业体制之下是难以想象的。并且，由于网络的便利性特质，给音乐的创作带来了颇为巨大的正面影响。一方面是前面所说的促进音乐人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则是对音乐文献的便捷整理与利用——youtube的出现让观



看和聆听上世纪20-40年代的演出成为了可能，last.fm和emule的大行其道则让每一个人都能轻易找到自己喜欢的音乐，而那些现任和潜在的音乐人正是通过上述的渠道汲取养分，创作出属于自己的音乐。

RADIOHEAD



不难看出，网络传播的兴起对于独立音乐而言确乎然是一股极具推动力的力量，然而一旦我们将目光投在独立音乐未来的走向以及独立音乐人所面临的经济境况之上时，情况就远不如上面谈及的创作与推广那么乐观了。对于Radiohead和NIN的在线发售，我无疑是鼓掌欢呼者当中的一员，可是一旦我们把目光移回中国，有许多问题便不能简单地以类比的方式来思考，或者说我们必须对于中国唱片业(尤其是大陆)的特殊情况有所考虑。

在当下，国内的许多地下音乐人/独立音乐人早已不再把唱片销售所获得的收入作为自己经济方面的主要来源——在他们看来，过去那个一朝出名，唱片大卖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而若干年前被视为收入来源保障的与唱片公司之间的一纸合约，现在则更多地是出于录音制作水平与发行渠道考虑的选择。在这一点上，国内音乐人观念的转变并不比国外晚上多少，尤其在这个国际唱片销售量连年下跌已不再成为新闻的时代。

国际唱片业把销售的希望放在了数字音乐的下载之上，他们希望数字音乐的下载收费能逐渐抵销实体唱片销售业绩方面的萎缩。但是放眼国内，尤其是大陆，数字音乐专辑下载的销售依然十分低迷，与之形成极大对比的却是手机彩铃所占有的巨大市场份额。尽管彩铃的具体销售数据无法取得，但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观察，以及对手机用户结构的大致了解，我们可以判断目前在手机彩铃市场占有巨大份额的依然是流行音乐。换句话说，尽管流行音乐和独立音乐同样都面对唱片销售的不景气。但彩铃方面的版权收入却依然可以给流行音乐人和唱片公司带来相当可观的利润。而在大众文化方面处于劣势的独立音乐则只能从中分到很小的一杯羹。这事实上成为了独立音乐人在面临唱片业萧条不得不进行转型的过程中所需要面对的困难之一。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还会发现：由于在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方面比之流行文化处于劣势，还导致了独立音乐在演出市场上的相对劣势。而这，亦成为其转型难题之一。

据RIAA预计，到2011年，数字音乐的销售可望真正抵销唱片销售所带来的营业收入锐

减。这一预测能否变成现实在业内人士眼里依然未成定论。但目前一个可观察的十分明显的变化却表现为演出市场的火爆与音乐人销售重点的转移。

国际上，在现场演出方面，票价的持续上涨已是不争的事实。滚石乐队在英国的最高演出票价早在06年就已经企及350英镑，而同样的前排位置同样的滚石在1990年只需要25英镑。哪怕是像在智利的Espacio Riesco这样一个月收入在250英镑左右的小城演出，Coldplay的票价也依然达致80英镑之多。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如此高企的票价却并没有导致空座率的上升，比如06年英国现场演出的上座率便提升了近11%。而这，直接导致了在07年的英国，总共排有450场大型演出。



而在国内，演出市场也正处于一种上升期。无论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还是像成都，杭州，重庆这样的中等城市，每到周末和节日，演出与party聚会都会排得满满当当。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演出不仅仅限于各种类型的音乐演出，还包括了话剧，影展等相关文艺活动。更值得注意的，还是在于在这些演出当中，商业性质的演出占到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换句话说，独立音乐在其中占到的份额是极为有限的。这一点可以从《城画》特稿中对于上海和广州地下演出的描述中得到佐证。以上海来说，若以演出的总体水准和密度来看都可称得上繁华，然而一旦剔除商演份额之后，却宛若空城，而本土文化中的音乐创作与商业演出的水准亦呈现出一种巨大的反差。

在国外，演出市场的火爆进而导致了音乐人销售重点的转移。于是我们看到，正有越来越多的音乐人步Radiohead的后尘从传统的大型唱片公司独立出来。他们把网络当作自身音乐的宣传平台，提供高品质mp3供乐迷免费下载，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地扩大自己的歌迷群体，以便在巡演的时候能赢得更多的乐迷前来观看。与此同时，在现场演出时，唱片不再是销售的唯一与重点，相比之下带有乐队或音乐人logo的体恤等周边物件成为了他们的重点促销对象。也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之下，CD唱片正式从音乐传播的载体转化为符号经济之下的纪念品。

反观国内(尤其是大陆)，由于种种难以梳理的原因，中国的唱片业(尤其是独立厂牌)对于大众/主流文化缺乏相应的影响力。摇滚或地下音乐依然属于亚文化的一种，它并没有能够

如同国外那般成为一种地上文化，成为一种极具市场号召力的文化。换句话说，国内地下音乐人通过在国内诸多小型演出场所巡演所获得的收入亦并不足以成为其主要经济来源，撑起其设备的购买与生活创作所需。只是由于大势所趋，而不得不参与到这一从唱片到现场的转型之中。近年越来越多的巡演，大约可算得上一种佐证。只是这样一种转型，却也在不经意间迫使国内的地下音乐人采取种种策略来提高来自唱片与现场演出的收入。比如左小祖咒的500元高价唱片，比如多见于北京的试验即兴(强调现场的不可复制)等等。相比之下，传统唱片业巨头旗下的流行艺人要比地下的独立音乐人更加容易完成这一从唱片到现场的转型。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许巍，唐朝以及瘦人等老牌摇滚音乐人在08年新专辑中被一些国外观察家称为“软化”的转型。根据这一趋势，不难预计的是：今后创作专辑中广告歌曲会越来越多，一如电影中的植入广告会越来越多。

正是站在这一点之上反观国内indie的发展，国内一直以来的文化管制和唱片业发展的缺失直接导致了独立音乐人在面临国际唱片业转型时的尴尬处境。而这样一种处境最终也必将影响到独立音乐的创作本身。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成都地下音乐与北京地下音乐发展的对比中得到较为清晰的证明。

尽管在近两年，成都不断有新乐队浮出水面，风格也越发地多元化，但就其创作水准和技术水平而言却并没有长足的进步。一个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时至今日，成都地下乐迷们耳熟能详的依然是当年阿修罗和声音玩具的几首成名歌曲。这意味着在近年内几乎没有同等分量的新创作出现，而彼时来成都演出时尚显稚嫩的广州乐队沼泽，却通过几年的打拼在自己的路上越走越远，令人尊敬。一旦把目光移至北京，其音乐类型的多样化和先锋化程度则远非成都可比。这其中自然是城市资源平台的因素在起作用——在北京，你可以更容易接触到国外的音乐人，接触到国外的音乐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目前不少独立音乐厂牌都在北京——独立厂牌的出现和与国外音乐人的充分交流使得北京音乐人比起成都或其他城市的音乐人更加职业，视野更加开阔，音乐路径也更加多元化，其上升空间也因而更加可观。而缺乏唱片业规范和支持的成都乐队往往流于松散，其音乐创作来源也越发单一，在无法在音乐风格上寻求更多的突破之后，只能转向所谓的生活化，口语化创作，大力挖掘成都特有的市民文化。然而，这样的文化资源并非是可以轻易被挖掘的，表面上的举重若轻却很可能一不小心就砸了自己



的脚。相反，北京音乐人的音乐素养令人敬畏。守望08年在D22的一场演出就被Alex Ross认为是他心目中08年的十大杰出演出之一，而其音乐风格更被认为是对极简主义的出色融合。反观同样作为地下音乐地标的小酒馆，在错失了发展独立音乐厂牌的机会之后，亦正渐渐失去其在地下文化方面的凝聚力，沦为的一处单纯的演出场所。

从理论的层面来看，演出市场的红火似乎是一种必然——从20世纪末就开始谈论的所谓体验经济似乎正渐渐瓜熟蒂落，落地生根。人们会更加倾向于在现场的演出当中寻找一种连接与狂欢，寻找一种归属与分享，寻求一个哪怕是短暂的共同体。对于不管是地上还是地下，独立亦或不独立的音乐人而言，唱片更像是一张菜单，而现场的音乐会才是大餐本身。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人们聆听方式的转变。在LP和CD时代，人们大多数时候都会完整地听完一张专辑；而在mp3时代，人们则开始有选择性地把音乐放入mp3当中。这一看似细微的变化，实则进一步加深了音乐的消费品属性，使音乐离其起源时所拥有的宗教性和仪式性越发地远了。而这一对音乐接受方式的变化，最终也将通过市场渠道作用于音乐本身。

也许就音乐创作而言，目前国内的indie音乐正如《城市画报》所展示的那样尚可算得上生机勃勃，但若考虑其经济境况及其未来发展，却依然是 前/钱途未卜。

11月20日，波士顿交响乐厅前入场的观众发现，当天本来预定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BSO）的著名俄罗斯指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Gennady Rozhdestvensky）没有出现在节目单上，替代他的是BSO的年轻助理指挥库尔蒂（Julian Kuerti）。在乐团给听众发的音乐会手册中，则夹着一张临时顶班的库尔蒂的简介。

这无疑让前来的观众们感到错愕，一切都很突然。事实上，就在演出当天的上午，BSO的网站上才临时更新了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不能演出（is not able）的消息，原因则无人知晓。这种遮遮掩掩无疑让人疑惑，毕竟指挥临时因健康原因取消演出本是常事，无需掩饰，除此之外，还有原因吗？

古典音乐界常有俗语，一个指挥的变故常常是另一个指挥的机遇。年仅32岁的库尔蒂当晚指挥不仅与当红大提琴家哈瑞尔（Lynn Harrel）有相当惹眼的合作，在他仅仅排练一场的情况下，成功地指挥柴可夫斯基的“曼弗雷德交响乐”，让颇为挑剔的波士顿观众，一边还沉浸在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突然失踪的不满情绪中，一面却仍然给予这位年轻指挥以少有的欢呼，第二天的《波士顿环球报》也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一颗新星已然升起。

不过谜团仍未澄清，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到底为何临时缺席，BSO仍然没有作出解释，而且后续还有两场演出是否能够登台，也似乎没有答案。但是随之有消息披露出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已经离开了波士顿！

离开的原因则是，排练当天，他与夫人在音乐厅休息时，发现海报将当晚演出的哈瑞尔放在醒目位置，而指挥本人却隐然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而这只是导火索，在BSO给会员发布的音乐季手册里的“杰出指挥名录”里，居然没有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名字。这位俄罗斯指挥顿时大为光火，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当天就飞离波士顿，也就发生了后来的临时顶班事件。

新闻一出，舆论哗然。在波士顿最大的新闻网站www.boston.com上，短短两天已经有超出上千条关于这次风波的评论。一部分人对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因为宣传策略而轻率地离开表示强烈的不满，甚至口出恶毒之言，认为这位“老家伙”完全是前苏联的文化特权者的作风，不懂得艺术演出的职业伦理；而同时也不乏批评BSO市场推广部门的声音，认为他们为了商业利益的考量，而忽视了对艺术家品质的考量，要知道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可以说是目前还活着的顶级指挥之一，如此对待这位继承着20世纪俄罗斯音乐传统的指挥家，无疑是BSO的耻辱。

意见顿时形成对立两面，看起来似乎水火不容。不过这种临时罢演，对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而言，已经不是破天荒头一遭了。2006年，他应邀指挥阿姆斯特丹



交响乐团（Amsterdam Sinfonietta），但是在酒店里却发现，乐团发行的纪念专辑系列中居然没有他的名字，这激怒了这位俄罗斯指挥，尽管乐团的管理层立即赶往酒店前去道歉，但是一切都无法挽回，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当夜就飞往巴黎。

按照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说法，他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的确，BSO的作法的确欠妥，毕竟对于这样一位曾经指挥过苏联大剧院乐团、BBC交响乐团以及维也纳交响乐团的著名指挥而言，商业或许从来就要为艺术让路，毕竟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欧洲，都是



由国家来出面资助艺术团体，艺术家在这种体制下容易成为社会主流阶层，且无生计之虞。因此很容易看到，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自视为这个社会的精英人物，荣誉与尊严是他们最为看重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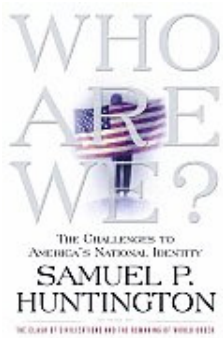
不过美国却显得十分特殊，政府对古典音乐乐团基本没有任何资助，都需要乐团自己筚路蓝缕，从头开始。以BSO为例，票房收入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乐团而言，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如何从观众中吸取捐助者，则是他们的一项主要任务。笔者曾经买票聆听过一场著名钢琴家波里尼的演出，随后BSO的市场推销部门便主动电话过来，热情询问未来我的听乐安排，让人受宠若惊。转念一想，对于他们而言，艺术是艺术，生意是生意，他们从来就不是高枕无忧的“政府文化人”，而是要自谋生路，而观众则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不可慢待。

对于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不告而别，BSO的市场营销管理层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如何吸引观众前来，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市场的一个策略而已，而且他们面临着在一个音乐季卖出1000万美金的票房重任，这些都是不得已之举。

作为一位在波士顿享受大量低票价演出的乐迷而言，BSO让我看到这样一个音乐团体在社会公益方面的重要作用，他们对于青年学生的推广不遗余力，甚至是不惜血本。可见BSO并非是一个利欲熏心的乐团，但是他们也不是财大气粗的政府部门，他们同样也要在残酷的文化市场里浴血奋战，区区一个波士顿，就有无数的音乐组织和各项演出，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存活而且有机会得以发展，实属一项不易的事业。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走了，或许在他看来，艺术本身是一项崇高，不可轻薄的事业，值得去为之捍卫尊严，只是他受惠于苏联与欧洲那样一个还在苟延残喘的国家文化体制，并不知道这个文化传统如今已是日薄西山，柏林爱乐的指挥西蒙拉特如今都已经在羡慕

中国的文化投入模式。对于美国乐团而言，尽管古典音乐无时不刻与金钱缠绕，与利益裹连，但是看起来却不失为一个妥协以求成功的可行之道。

福阿德·阿加米
(Fouad Ajami)

四年前出版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可能是他最为热情洋溢的作品。亨廷顿上周去世，享年八十一岁。而这本书正像这位有名的哈佛政治学教授一样——观点独特而谨慎，但总不免被卷入近几十年来的政治风暴中。

“我的爱国者和学者的身份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他写到：“我的国家是建立在自由、平等、法律和个人权利上的；作为一个爱国者，我深切关注着它的统一和力量。”亨廷顿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既没有寻求争议，也没有躲避它们。《我们是谁？》有着这位伟大学者的特征——由严格细节支撑的勇敢而彻底的断言，以及对于时代问题的关注。

他在同名书中阐述了“美国的信条”及其在精英阶层的瓦解。他认为，“美国的信条”的核心——英语、基督教、宗教虔诚、法治在英语文化中的概念、统治者的责任以及个人权利——是从“十七、十八世纪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所拥有的独特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中发展而来的。

认为这本书烙印着毫不掩饰的本土主义的批评家们其实忽视了重要的一点。亨廷顿写到，他是在论证“盎格鲁-新教文化的重要性，而非盎格鲁-新教人民的重要性。”他说，这个伟大共和国的成功，迄今为止一直建立在数代美国人对开国者所秉持信条的自发尊重，以及对旧秩序的自发抵制上。但这种自发性正遭到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打击。新的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对美国的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缺乏深厚的感情。他在《我们是谁？》中写到：“星条旗降下了一半，而别国的国旗在美国国家认同的旗杆上飘得更高。”

亨廷顿认为，美国的未来会有三种可能：世界性的(cosmopolitan)、帝国主义的和民族的。第一种可能是世界重造美国，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义超越国家认同。第二种是美国重造世界：缺乏与之抗衡的超级大国，美国试图用自身的价值观改造世界，传播民主制度的规范和理想。至于第三种，美国仍是美国：它拒绝世界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诱惑与虚伪。

亨廷顿并不讳言，他更愿意看到的是一种美国的国家主义，它“致力于保存和加强从建国之初起定义美国的那些特质”。强硬的现实感使他对克林顿时代的全球主义毫无耐心。“达沃斯人”文化——那些全球精英的社交场景——与家园、健康及国家土

壤的召唤是脱节的。

但他对美国远征伊拉克也持怀疑态度；那些深信美国的“帝国”使命的保守主义者令他很不自在。他曾预见到这种使他民主化的任务会以挫折收场。他指出，美国民众不会对伊战一直支持下去，何况还存在着一种“民主的悖论”，即民主的实验往往带来其脆弱的民族民粹主义运动（拉丁美洲）或原教旨主义运动（穆斯林国家）。世界招摇着权力，却拒绝给予。这是一个亨廷顿式的世界；没有虚妄也没有救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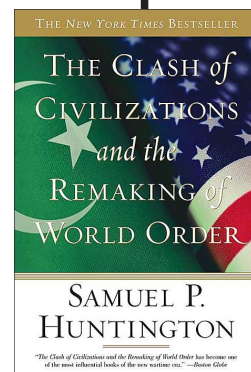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达沃斯人和其他深信世界无国界的人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亨廷顿以《文明的冲突》从学院中走出，享誉全球。在这篇原本发表在1993年《外交事务》上的文章（后来扩展成了一本书）中，亨廷顿预言了后冷战世界的状况。意识形态的战争将导致文明间土与血的争夺。这将是西方与八个其他文明间的争夺——拉丁美洲、非洲、伊斯兰、中国、印度、东正教、佛教和日本。

在这场文明争夺战中，伊斯兰将称为西方世界最主要的挑战者。“伊斯兰与基督教——不管是东正教还是西方教派——的关系一直是紧张的。每一方都是另一方的‘他者’。相比伊斯兰与基督教世界持久而深远的对抗关系，二十世纪自由民主体制与马列体制的冲突不过是短暂而肤浅的历史现象。”

他的理论攻击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世界留意了他，这本书遂被翻译成39种语言。批评者坚持认为人们需要的是索尼（Sony），而不是土地（soil）。但是9/11那天，19个年轻的阿拉伯人加入了行动。他们刺穿了时代的幻象，佐证了亨廷顿的想法。他曾以其特有的准确语言，描述了“年轻人占多数的”（youth bulge）令人不安的穆斯林社会，这些激进的阿拉伯青年被现代性释放，却没有掌握现代性的力量；他们是这个激进年代的产物。

请允许我讲述一段个人故事：1993年，我在《国际事务》上发表了一篇针对《文明的冲突》的首席评论文章。我钦佩亨廷顿的著作但并没有被它说服。我所信奉的是西方构筑的现状。我论证道，西方的方式已经称为了世界的方式，而现代社会的共识会在重要的第三世界国家如埃及、印度和土耳其维持。十五年之后，我有机会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承认自己当年的观点是错的，而亨廷顿一直是正确的。

后来，我收到一封亲切的信，来自亨廷顿51年的妻子南希·阿克莱·亨廷顿（她的亚



美尼亚血统对于那些指责亨廷顿为本土主义拥护者的人是一种讽刺)。亨廷顿身体很不好，正忍受着轻度中风的折磨。因此夫妻俩选择在马撒葡萄园的避暑别墅度过冬天。而南希已向卧病在床的亨廷顿读了我写的文章，他听了很高兴。“他会很快亲自给你写信的。”他当然并没有写。知道他虚弱的状况，我也没有指望他会给我写信。亨廷顿是伟大的智慧源泉和模范，能有机会写关于他的文章并对他有所了解（很遗憾，这些了解相当少）已经是我的荣誉了。

今天的学院没有像他这样的人。他所倾力的政治学如今被新一代人统治着。他们是“理性选择”的一代，与模型和数字工作，用贫瘠和费解的术语写作。

更重要的是，如今学院内外都在嘲笑那标志着亨廷顿工作与生命的爱国精神；他所支持的美国信条更是被视作意识形态上的粗鄙之物，只有顽固守旧的人才会相信。达沃斯人可能已经取得胜利。亨廷顿晚年作品中的痛苦和忧虑也就并不奇怪了。

注1：作者福阿德·阿加米(FOUAD AJAMI)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专攻中东研究。他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本文原载《华尔街日报》评论版）

注2：达沃斯人(Davos Man)是一个贬义的新词，指自认为很国际化的全球富裕精英阶层。亨廷顿正是这个词的发明者。——译注

我认为，我们需要
 一种新的认识，来看待我们的
 问题。一种平和的
 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压力。需要一种精心
 挑选的（母亲提示我不要
 “口气硬硬”）语调
 来谈论我悬而不决的
 “人生大事”，一些桥梁，来逾越我们的沟壑，
 一阵清风，来冲淡我们的困境，
 一把利刃来剖析
 它的原因，一种智慧，来照明可能的
 解决之道。来提起以前一段想尝试
 但放弃的婚姻，避开由此
 的扼腕，和谴责。并随时准备
 一个灭火器，来浇灭
 随时绽放的火花。对于那个不完美
 但喜欢的女孩
 的爱和纠缠，她过分的要求，以及
 六七年的疼痛我可以
 作个评估，并把她放飞在遥远的国度！关于其他岛屿的
 走马灯般的女孩的无果而终我也
 会作个说明。我敬重我们的
 习俗和方言，热爱我们的船只、柑橘、
 贸易和海域，也了解我们的根。但我感到你

眼睛中的灼痛，
像被火烧，甚于我！一束幽怨从镜子射来！在我们移动的空间，
承载着几百吨凝固的气体
重如火山，我希望雨神和云神，组织
几十支消防队，准备
冰冻的雪川，或者山上的湖水随时候命。我该如何
向你说明呢，我的内心一直有一个影子，若有若无，挥之不去，千百次我呼喊她（她不叫海伦），
在梦中见到她。她像泉水一般，像晨雾
也像海底的火焰。我已不用象牙或大理石，而用意念
在心中，塑造她变幻
无端的形象：比尼多斯的
阿芙罗蒂德还要美，她是我有生以来最美妙的作品，
这点我们不用怀疑。每天
我用手指触摸她，她也给我启示：
缘份之神会让她随时
像雪莲一样
浮现在我的面前。只是她现在隐身于茫茫人世
谁也见不到她。只是一一时光压迫着、拷打着我们，
追击着我们，我们像凄惶的野兔
四处奔逃。“生命是短暂的”，我们的血脉连在一起
我们的衰老也是。原谅我吧，我
一直细察你的神情，
也有母亲！在我不忍她持续不断的咳嗽时在我
面对你愁苦无端的脸容时，我
也企图和你

交换我的灼痛，但你不领受，我们习惯了长期以来的沉默……

——沿着海边，开着车，

无限的风光不停地纳入视野。

然后我慢慢看到

浩淼的内心中淡薄的山峦，

……融化于海风的

热泪的往事，孤傲的海岸忍受着波浪经年累月的击打，

无言的云朵要

作为某种伟大风格的索引

授权网络首发媒体：学术中国·阅读在线
授权纸面首发媒体：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
shrbooks@gmail.com，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来信告知。